

俄国的空间讹诈

列·弗拉基米罗夫著



供内部参考

381
496
111

俄国的空间讹诈

登月竞赛的内幕

〔苏〕列·弗拉基米罗夫著

上海新乐五金生产组工人曹山三结合译、校
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 78年7月10日

Leonid Vladimirov
The Russian Space Bluff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oviet Drive to the Moon
The Dial Press, New York,

1973

根据纽约戴尔出版社1973年英文版译出

俄国的空间讹诈

登月竞赛的内幕

〔苏〕列·弗拉基米罗夫著

上海新乐五金生产组工人曹山
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

总结译、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25印张 106,000字
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2·190 定价0.42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俄国的空间讹诈》系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夫所著。作者原为苏修《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编辑，早年学习过机械制造，后在莫斯科航空学院肄业。他在1960年至1966年作为一名工程师与科学编辑，曾同苏联空间专家接触频繁，由此为撰写本书收集了许多材料。1966年他访问伦敦时留居英国政治避难。他写的另一本书《俄国人》，曾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西方出版。

《俄国的空间讹诈》叙述了苏联最初各颗人造卫星以及后来“东方号”，“上升号”和“联盟号”各艘宇宙飞船的研制和发射经过，揭露了苏修空间讹诈的一些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者的立场是反动的。书中有不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地方。

本书原文为俄文，后译成英文，于1973年在纽约出版，这本中译本是根据英文本翻译的。

目 录

阿纳托利·费多谢耶夫的序言	1
作者序言	5
第一章 第一颗人造卫星	13
第二章 “沃斯托克”——东方	58
政治上的空间竞赛	
第三章 “沃斯霍德”——太阳升起	103
俄国的空间技术	
第四章 日薄西山	128
桎梏里的研究	
地 图	164

阿纳托利·费多谢耶夫的序言

苏联的科学研究大部分是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以致局外人，尤其是外国人，对于苏联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很难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但是，空间研究，顾名思义是在露天进行的，全世界都可看到。你也许因此就认为，只需仔细研究苏联在空间方面的成就，就会给西方观察家对苏联科学的现状提供可靠的向导。其实不然。

殊不知苏联的科学技术是完全置于这个极权国家的支配下的，它们的进展也完全服从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目的。这未必是坏事，假如这个苏维埃国家主要关心的是替它的人民谋求物质上与精神上最大福利的话，这也可能是好事。不幸事实并非如此。今天统治苏联的那一小撮人的主要目标是保住他们的权力。假如这个目标凑巧同改善苏联人民的命运相一致，那是上上大吉。但要是 inconsistent 的话，那人民就得受苦。

苏联空间研究的性质和方向，主要地不是由种种科学上的考虑，而是由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决定的。主要的标准是：看某一项研究工作能把苏联的军事潜力和苏联在世界上的威望提高到何种程度。而且，尽管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或许就因为有了它们——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因而政府所能支配的总的资源就大大地少于美国。虽然苏联领导

人据有能够剥夺人民许多在西方被视为必需品的手段，他们所能做的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

这种局面的结果是，关于重大的科研项目的决定常常是非常武断地作出的，难得根据健全的科学推理，而往往只是反映了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偏见或野心而已。科学工作所处的那种秘密状态，是助长武断决定的又一因素。由于除了领导集团成员之外谁也不知道到底在进行什么工作，他们便能随心所欲地干任何事而不必解释他们的决定。

保密还有另一个理由，特别是当保密的对象是苏联科技水平真正依靠着的主要科学家时，尤其需要保密。苏联当局使他们湮没无闻的原因，并不是担心他们被人绑架，无宁说是因为一旦这类人为公众所知，他们便可能得到名气和势力，足以成为政治领导人的强大的、可能是危险的反对派。只有那些无力进行最轻微的反抗的科学家，当局才泄露他们的身份。一个人不管他本人认为如何重要，假如他在苏联国内外都是不为人所知的，那要摆脱这样的人就轻而易举了。

这样，苏联科学界所展示出来的一幅图景就同任何西方观察家的逻辑大相径庭了。它跟任何民主国家的惯例毫无共同之处。难怪从苏联得到的情报有许多反而足以使一般西方人感到困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数年前当本书作者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夫最初商讨本书的主题时，没有人接受的原因。只是在最近数年，由于苏联空间研究很少进展，并遭受了四名字航员丧生的悲剧之后，多数西方观察家才产生疑问。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夫这本书的一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对苏联空间“计划”的迂回曲折提供了一个完整而令人信

服的解释,并揭露了苏联科学技术在空间研究方面的可悲状况。至于我,我只能说,苏联科学技术的其他方面也存在着同样悲惨的局面。

当然,笼罩着苏联空间研究的那种气氛以及那种讹诈现在所得到的结局,并不能反映成千上万参与这项工作的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劳动成果。苏联其他许多有才干的人也遭到了与那个伟大的科学家兼设计工程师谢尔盖·科罗廖夫相同的命运。尽管这些人不得不在非人道的压力下工作,并且遭受最可怕的惩罚,他们仍然完成了创造性工作的丰功伟绩,并为他们国家的科学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苏联统治者利用他们不受限制的权力,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恣意歪曲和滥用科学成就,这并不是那些科学家的过错。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夫批评谢尔盖·科罗廖夫,说他是“讹诈的一大炮制者”,我觉得难以同意。讹诈一事不能由科罗廖夫负责。实际上,他的成就倒是一幅生动的写照,世人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有伟大创造能力和性格的人如何反抗一种卑鄙虚伪的政权。另一句话我也不能苟同,即:苏联之所以能够制造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乃是靠着间谍活动和庞特科尔伏^①所提供的情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抗击苏联军事潜力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简单而省钱了:只需加强美国科学工作的保密性并改进美国反情报工作的质量就行了。

^① 庞特科尔伏,布鲁诺·马克西莫维奇(Pontecorvo, Bruno Maksimovich, 1913—)——苏联物理学家,生于意大利,1933—1936年在罗马大学任教,1936—40年在法国,1940—43年在英国,1943—48年在加拿大,1948—50年在英国从事科学工作;1950年去苏联,1955年为苏共党员,1958—54年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4年以后任院士,曾得列宁勋章和列宁奖金。——译者注

苏联之造出原子武器，当然不是美国情报工作疏忽的结果。须知苏联是一个为了发展新式武器能够动用巨大资源的极权国家。而且，不论苏联的科学工作组织得多么差劲，但总的说来，苏联的人口不少于其他国家，而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总数则大大超过其他地方。我认为弗拉基米罗夫先生过低估计苏联在这方面的可能性是错误的，特别是要是我们记着，对于苏联统治者说来军事技术是天字第一号最优先考虑的事的话。

总之在我看来，本书的出版是一件大事，因为它把苏联统治者进行空间讹诈的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

阿纳托利·费多谢耶夫(签名)

1971年8月18日

(阿纳托利·费多谢耶夫在1971年逃亡西方之前，原是苏联高级雷达科学家。)

作者序言

我离开苏联前往英国要求政治避难时，就确定无疑地知道，苏联已经悄悄地放弃一切同美国进行“登月竞赛”的迷梦，首先涉足月球的将是美国宇航员而不是苏联宇航员。关于这一点以及其它种种，不光是我，还有我的许多同事——莫斯科科学作家，都是了如指掌的，更何况那些参与空间飞行的科学家和其他专家了。

但随后我惊讶地获悉，西方每个人都持与此相反的见解。那些乐观透顶的人，甚至科学家中间，也认为美国即使在登月竞赛中能够超过苏联，也得豁出去干才行。“阿波罗”计划比预定的提前一年进行，而不顾弗吉尔·格里索姆和他两个伙伴丧生的惨剧，显然是由于这种急匆匆和老是回头观望苏联动静的习惯，生怕它有一天会发射一艘载人的登月飞船。毫无疑问，由于加紧行动的结果，使整项计划的开支远远超出预计。但在1966年，甚至在1969年，西方大多数人依然相信；美国人再怎么加油也没用，苏联的国旗将比任何其它国家的国旗抢先在月球上飘扬。

看来人们还都蒙在鼓里，诧异之余，我决定立即提笔，把我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好叫一些人放心，同时不消说也要叫另一些人失望。可是不成！我同我的文学助手都发现，要说

服英国出版商接受一本声称苏联在空间研究方面落后于美国的书，那是不可能的。一开始碰了几个钉子，之后，我决定去找一家伦敦最大、最有地位的出版社的董事商谈。他听我把话说完，耸一耸肩，回答道：

“您的话挺有意思。可是据我知道，是俄国人首先发射人造卫星，首先把一个人送入空间，首先进行运载一个人以上的太空飞行，首先让一名字航员在太空船外面行走的。至于月球，甚至在那里，俄国的‘月球卫星’也是破天荒第一颗。不管您怎么说也无法改变这些简单的事实。而现在，假如我出版您的书，预言美国人将赢得‘登月竞赛’，那您可想象，要是苏联赢得了胜利，您我可真得出洋相了。”

“可那是不可能的啊，”我喊道。

那出版商看了看手表，说：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的事恐怕越来越少罗。不过，要是真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的话，不瞒您说，那就是出版您的书的事了。至少在我们得到谁将首先……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

当时我初到西方，便相信我的出版界朋友的经验，打消了我写书的念头。而随后，正如可以预料的，美国发射了“阿波罗—11号”，接着发射“阿波罗—12号”，英勇的“阿波罗—13号”和“阿波罗—14号”。我当然很后悔没有披上预言家的斗篷，但在最初登上月球的三个美国人回来之后，一读西方报刊，甚至使我更加痛苦而大惑不解了。别说老资格的科学新闻记者，就连严谨的学者都一味猜测是什么原因阻碍苏联在最后一刻超越美国。《航空周刊》杂志对据说曾在拜科努尔苏

联“宇宙发射场”上发生的某次爆炸发表了一篇短短报道。(可笑的是,在拜科努尔或那个哈萨克小镇附近,当时没有,也从未有过任何“宇宙发射场”。甚至在这一点上,苏联的假造情报的专家们仍能欺骗许多西方人。)而许多报纸杂志立即开始煞有介事地说,可能有一枚新式超级苏联火箭正当要把一艘宇宙飞船送上月球之际蓦地爆炸了。

后来我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惊愕地读到一篇关于1969年10月三艘苏联宇宙飞船飞行(又一次在美国人登上月球之后)的评论。众所周知,无论从科学或技术观点出发,那次飞行过程中没有什么创举。但《泰晤士报》却以一种惊慌的口吻写道,那七名苏联宇航员在三艘宇宙飞船中的飞行,无疑地标志着空间研究方面的一场革命——苏联人将以此使一切美国的成就黯然失色。

而到1971年,甚至在美国第三次登月使命完全成功之后,认为俄国人依然“领先”的观念还很流行。1971年4月,在把一个名叫“礼炮号”的“空间站”送入通常的环绕地球的轨道之后,苏联派一艘载着三个人的宇宙飞船“联盟—10号”去追赶它。这种飞行并无创新之处,因为美国宇航员(附带说一句,尼尔·阿姆斯特朗是首创者)早已飞行过好几次了。然而,且看英国报纸是如何报道这件事的(我援引1971年4月23日《新闻晚报》上的话):

“据信,‘联盟—10号’乘务员有两名已在‘礼炮号’上‘安家落户’以便进行太空实验……俄国人尚未披露被选派去乘坐‘礼炮号’(亦即太空室)的三人小组成员的名字……现在他们在建立第一个永久性太空站的竞赛中无疑地远远走在美国

人前头。”(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实际上,当时完全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那次使命似乎已完全失败(虽然苏联当局不可能承认这一点)。

但即使果真有几名苏联乘务员从“联盟—10号”爬进了“礼炮号”,依旧不存在什么“竞赛”问题,更谈不上在任何方面“远远走在美国人前头”了。理由很简单:假如谁发射一颗卫星,随后用另一颗卫星为它运送人员,这并没有朝着建立一个“永久性太空站”的方向迈进一步。因为每当他需要替换人员或运送补给品时,就得花费全部代价(包括丧失整个太空运载工具在内)使用另一艘太空飞船。他必须先发明一种可以回收的穿梭式短程运载工具来与之联络,才能建立一个永久性太空站。这正是美国宇航局正在做的,所以第一个真正的太空站预定将在1972年至1973年间由美国宇航局发射。

苏联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又无力研制一个穿梭式短程运载工具,于是他们决定玩个花招:发射一颗人造卫星,用另一颗人造卫星为它运送人员,就把这个实验叫作“永久性太空站”。遗憾的是,由于西方报纸的帮腔,有些人乖乖地被欺骗。

我写本文时“礼炮号”依旧在绕地球运转——由于“联盟—10号”为它运送人员所作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上面空无一人。第二次尝试(跟第一次一样花费)很可能会成功,而随后呢,我预料新闻界又将鼓噪一阵,大弹其俄国人“远远走在前头”之类的老调等等。

我所遇到的最突出的反应是一篇登在一种流行的法国杂志上的文章,它总结了“登月竞赛”的结果。该文大意如下:正当美国人不顾血本,迫不及待地要超过苏联而歇斯底里地

(那是原文所用的字眼)冲向月球时，苏联却冷冷静静地拒绝加入这么一种无谓的举动，反把资源用于建造有用得多的有轨道的太空站，这种太空站无疑不久即将射入空间。

这后面一篇文章的语气姑且说是受了风行法国的反美思潮的影响吧。但却不能指摘《泰晤士报》或《航空周刊》怀有同样的感情。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西方报刊的判断，甚至某些科学界关于苏联空间研究的见解，何以会违背事实真相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呢？

其原因可以在那种大规模的、异常成功的讹诈把戏中找到，这种讹诈把戏苏联如此巧妙地玩弄了十二年之久，使其它国家都不能摆脱它。即如今天，虽然美国人能够往返月球，虽然许多苏联空间设备能在国际展览会中同美国的设备加以比较，但人们对于苏联在空间方面的所谓“领先地位”的幻觉几乎依旧不受触动。假如这本书能帮助一些人从这种催眠状态中解脱出来，那我将感到高兴。

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可望在本书找到任何“反俄”的东西。恰恰相反，由于我了解苏联空间研究创业的情况，我深深敬佩那些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冒着生命危险终于达到能够进行实际空间发射的人。其中许多人我有幸相识，而其他人的情况也知道不少。实际上，他们都以杰出的工程师的才能和无限地献身于他们的工作而著称于世。尤其是苏联空间飞行之父谢尔盖·巴夫洛维奇·科罗廖夫，此人无疑是个天才，是个纯真的狂热者。

不幸，杰出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才能和热情，都被苏联独裁政权用于同科学或人类的利益几乎毫不相关的目的。许

多科学专家完全知道这一点。但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科罗廖夫本人也深为这种可悲的局面所苦。尽管他随时能直接谒见赫鲁晓夫，备受宠幸，而且被认为是个神通广大的人，但他也束手无策，不能改变这种局面，虽然他晚年曾力图这样做。

苏联用以玩弄空间讹诈把戏的主要武器过去是，现在还是那种包罗一切的保密性，苏联一切略有重要意义的科学工作都是在这种保密性的掩护下进行的。任何人，不论职位高低，“泄漏国家或军事机密”，都被送进劳改营服役八年，这一事实是保密性的保证。假如那人出于粗心或多嘴而泄漏“机密”，那就是徒刑八年。假如那机密情报是故意泄漏给旁人的，那惩罚要严厉得多，就要判处死刑或近乎死刑。为此原因，遗憾我不能在本书提及我所有的消息来源，因为不然的话，这些依然在世并正在苏联镇压气氛中工作的人们就会立即遭到报复。我必须故意改变事情发生的地点、人们的工作甚至他们的姓名，免得让秘密警察找到那些对我推诚相见的人们的踪迹。

但我必须指出，我手头没有任何在苏联等于一个军事机密或者商业机密的技术情报——没有在西方面属于机密情报的东西。我在从事空间研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中间的朋友从未谈及这类事情，而我也不想打听。但你在阅读本书时会认识到，苏联当局认为不但对于计划、专利和发明必须保密，而且对于工作条件、特定事件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技术上的落后状态也必须加以保密。无奈每个苏联技术人员和科学作家对于这类“机密”却都知道得太多了。而我碰巧既是个工程师，又是个科学新闻记者，同苏联空间专家接触达六年以上

(从1960年至1966年)。

写完了这篇非写不可的引子之后，我就可以开始谈今天月球上何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苏联宇航员的来龙去脉了。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夫

1971年

